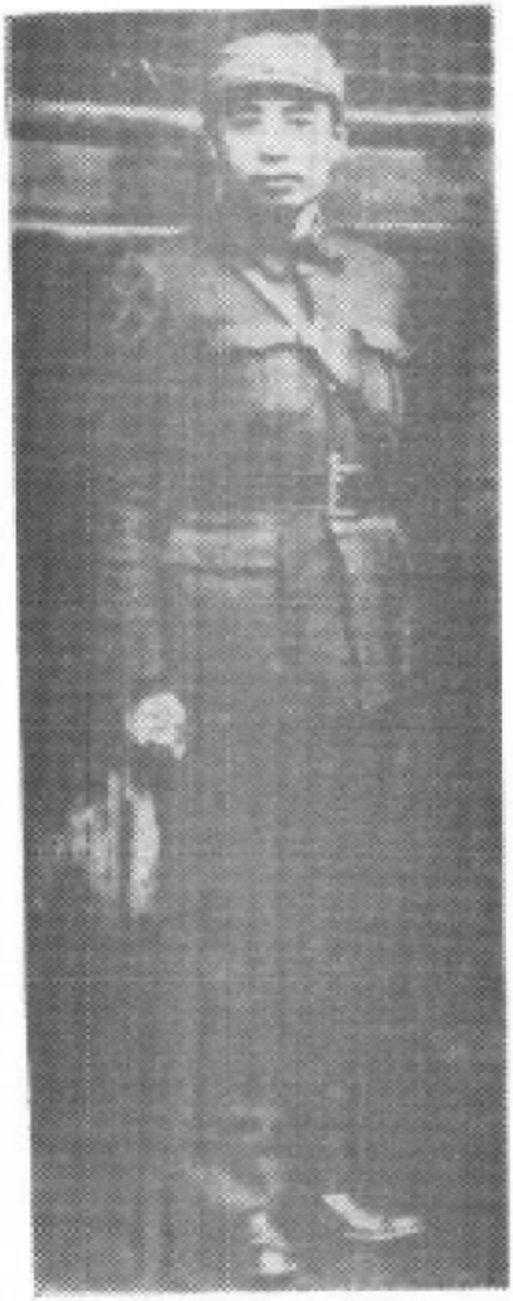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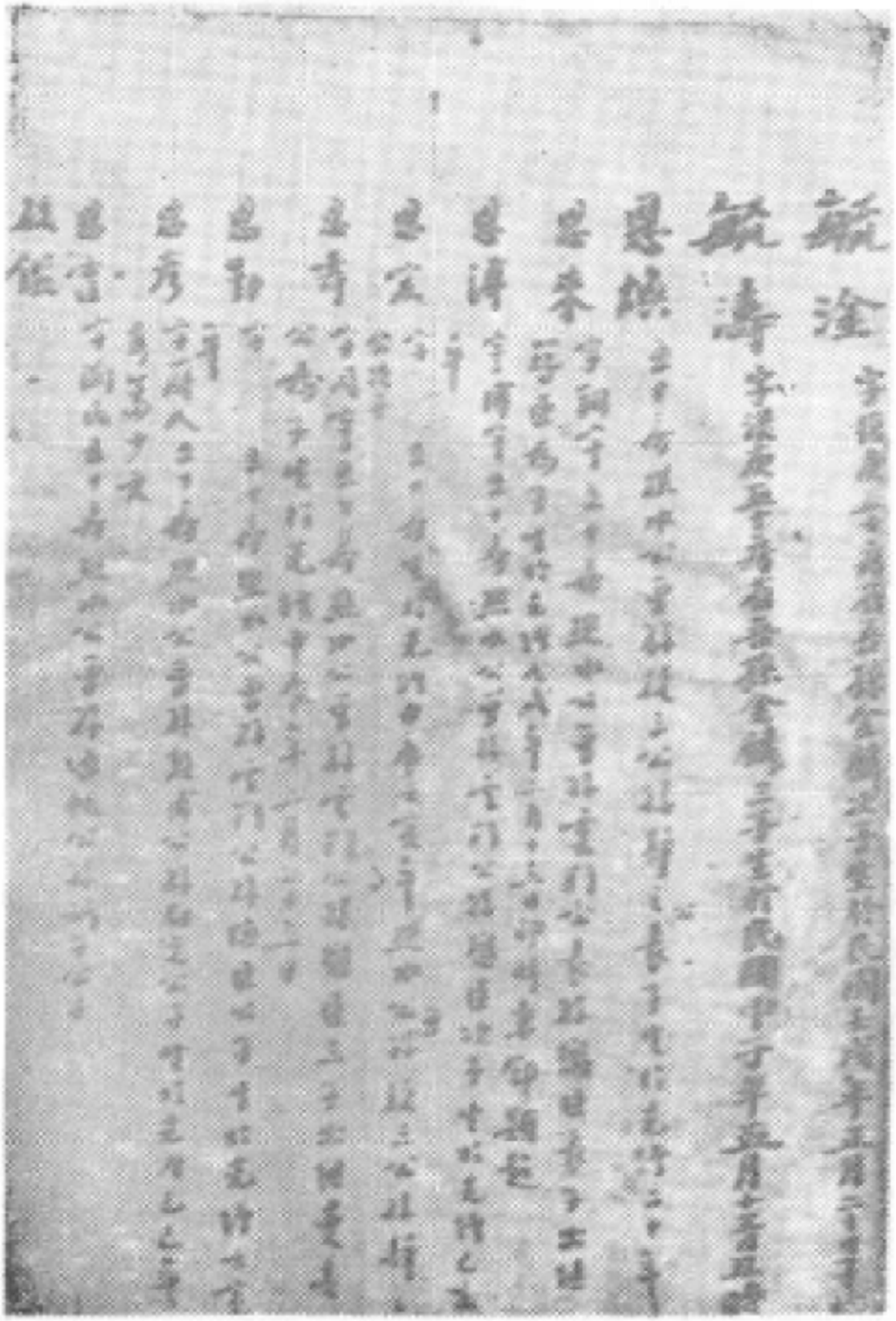


周恩来同志一九三九年三月摄于绍兴王子余庭院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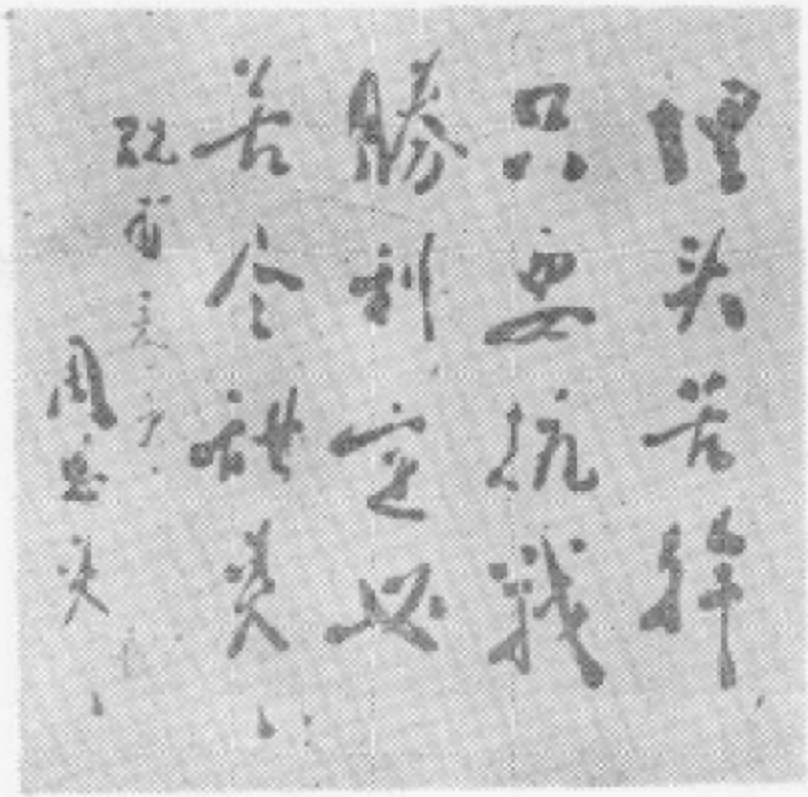
周恩来同志摄于绍兴大禹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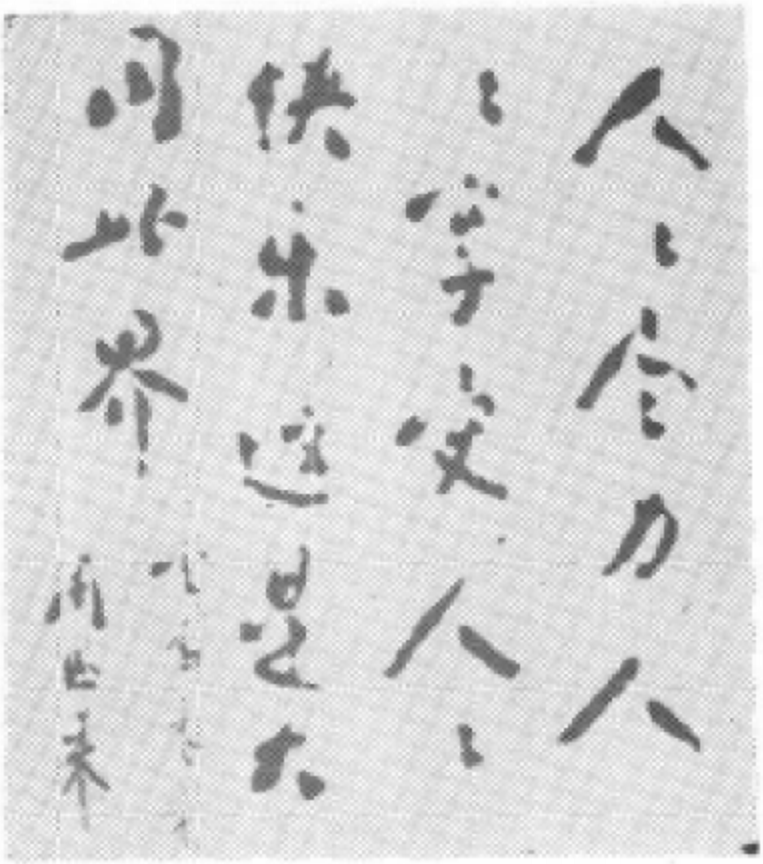
周恩来同志一九三九年三月在绍兴百岁堂周氏宗谱上亲笔题写祝妄兄弟和郑颖超同志等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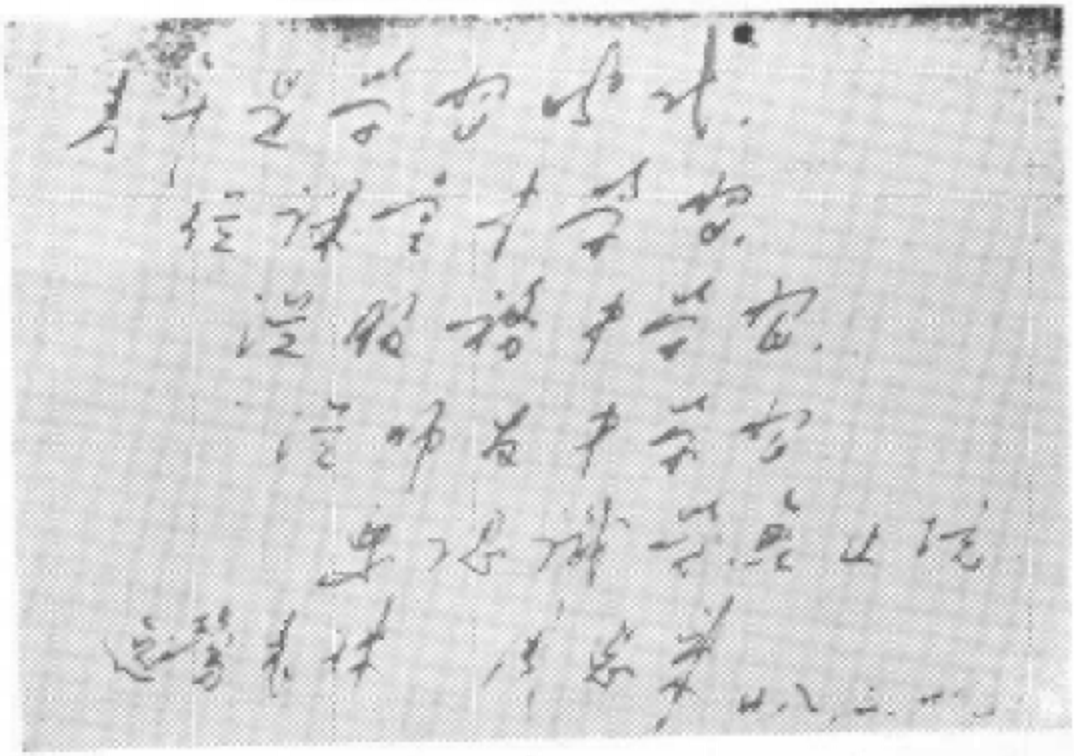
周恩来同志为王瑶卿表叔的题字



周恩来同志为王凤卿表弟的题字



周恩来同志为王云冉表弟的题字



周恩来同志为王逸雪表妹的题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我采访蒋介石……徐铸成（ 1 ）
我任蒋介石监印官追忆……姜辅成（ 5 ）
我所知道的钱大钧……顾执中（ 17 ）
中英空军情报合作亲历记……邱沈钧（ 22 ）
爆破钱江大桥……李文骥（ 37 ）

周恩来同志绍兴省亲记……宋子元（ 41 ）
狱中结识方志敏……胡逸民（ 57 ）
护送吴山民上四明山……毛　英（ 70 ）
一个革命家庭的母亲——陈龄……沙孟海（ 75 ）

鲁迅先生琐事……许伯年（ 79 ）
与郁达夫的交往……严北溟（ 82 ）
我的丈夫曹聚仁……王春翠（ 86 ）
知名爱国人士范寿康教授……毛翼虎（ 93 ）
史学家何炳松……赵镜元（ 109 ）
化学研究先驱者钟观光……蒋维乔（ 119 ）

之江大学……张文昌（ 123 ）
忆母校复旦大学……朱仲华（ 131 ）
西涧草堂藏书纪略……蒋启霆（ 143 ）
沈家桢和陈式太极拳……邵旭丹（ 149 ）
湖州王一品笔庄……费在山（ 157 ）

我采访蒋介石

徐铸成

我于一九二七年跨进新闻界的大门，开始在北京国闻通讯社当记者，兼为天津《大公报》采访新闻。那时，北京还在“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统治下，而南方则国民党已在南京建立政权，直到一九四九年它被迫退往台湾，我以记者身份，看到他从兴起到瓦解的全过程。

但我在采访政治新闻的初期，主要是跑太原、广州等地采访反蒋的内幕新闻，一次也没有去过南京。在国民党的“三巨头”——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中，只和后来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个别谈过三次话。蒋介石则仅在采访的公开场合见过屈指可数的几面。

第一次是在一九二八年。那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底定平津”。在此以前，日军为破坏北伐，悍然出兵侵占济南，造成“五·三惨案”，屠杀我军民以万计，外交交涉员蔡公时遇害。

蒋为了“完成统一大业”，首次偕新婚不久的宋美龄夫人到甫改名为“北平”的北京。

他们的专车为了避开济南——还在日军占领下，从徐州折入陇海线，再由平汉路北上。

他们到平那天，我随记者群前往采访。西车站——前门外平汉路车站前早已搭好彩牌，车水马龙，欢迎者包括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北平政治分会主委张继等云集，自不必说。专车驶进站台，在欢呼声中，蒋手挽新夫人下车，检阅仪仗队，然后出站

登车直驶北京饭店。

当年蒋还是一位年轻的总司令，蓄有短髯，军装外披着习惯的黑披风，风度翩翩，与新夫人恰是一对“神仙眷属”。

我在国闻社只发了简单的新闻。当时，新闻界最活跃的“时闻社”社长管翼贤（后当汉奸）却着意描述宋美龄穿什么旗袍，着什么鞋，连他们坐的汽车号码也加以发表。他还买通了北京饭店五楼的侍役，蒋何时入睡，何时偕夫人外出，何时某要人要谒见，谈了几分钟，都向他报告，时闻社按日发表了蒋的“起居注”。

第三天，蒋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又见了他一面。他出场时怒气冲冲，开头就说：“北平是几代古都，封建传统很浓厚，希望新闻界勿沾染旧习气。对女人评头品足的坏习惯最要不得，这是对女性的侮辱……”等等，“训斥”了一番后，没有多谈他此行的计划，只简单说要敬谒总理灵柩，告慰在天之灵。记者们也噤若寒蝉，不敢提什么问题。招待会就匆匆结束了。

蒋那次到平，主要“回目”是西山谒灵，打算率同各集团军总司令及其他重要将领，瞻拜碧云寺中山先生灵柩（那时南京中山陵尚在规划中），表示北伐大业，已经完成。但由于他“一念之差”，或者说是“一念之私”，不仅使这一幕几乎无法“上演”，而且种下了以后频年混战的祸根。当时北伐的主力，是靠冯玉祥将军率领的第二集团军。蒋却竭力抑冯扶阎（锡山），不许二集团军开入平津。所有河北、平、津的重要职位，都发表了阎系人物，只有北平市长一席，给了冯系的何其巩。冯忿忿不平，先以养病为名，逗留在豫北的百泉；几经电催，又在保定下车，说是要祭扫先人之墓。这样，预定的谒墓日期，一改再改。直至已“铁定”举行的那天，蒋、阎、李（宗仁）等已分头出发西山，冯才出站，乘车匆促赶到。

最近，我带的复旦研究生贺越明同志，从旧报中搜集我过去所写的通讯，编次为通讯选，其中“碧云寺祭灵记”一篇中，有

一段写道："蒋介石总司令首先拾级而登，着新武装，罩以玄色披风，神采奕奕，随后者为冯、阎两将军。阎也着黄呢新军服，上将三星耀目；而冯则依然土布棉军服，一身尘土，脸色微黄，不掩病态。其后为李宗仁将军，青年将军气概。紧随他们之后，则有白崇禧、方振武、贺耀祖、张荫梧、楚溪春诸将军，……祭堂肃穆庄严，素烛高烧，香烟缭绕，……"

蒋离平的前两天，我得知翌晨他将赴陆军大学（原北洋政府所设）对全体师生训话。我先半小时到西直门内的陆大，访校长黄慕松，要求旁听，得其俞允。九时，蒋由黄陪同下进入礼堂，全体起立敬礼。蒋和前座的教官们一一握手。黄也介绍了我，也握了手。这是我生平唯一次和他握手。后来，黄就南下，受到蒋的重用。

蒋抽于言词，宁波口音极重，几乎每句都带有"这个，这个"。演讲约历一小时。当时，在场的新闻记者只有我一人。我详记此新闻及蒋演词大意，寄天津《大公报》，成为"独家新闻"。

一九三二年初，我由《大公报》派往汉口，当特派记者历四整年。一九三三年，蒋在汉设"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还在国外的张学良将军任副总司令（旋即回国就任，代行总司令职权）。蒋由南昌经九江乘军舰抵汉履任时，我曾到码头采访。码头戒严，文武百官毕集，自不待絮述。我还记得一事：当时汉口公安局长兼总部总务处长陈希曾，为蒋的后辈亲信（陈其美先生之侄，果夫、立夫之堂弟），在场指挥一切。不知因何事引起蒋的恼怒，突然松开宋美龄夫人的手，对陈踢了一脚，还加上一句"娘希匹！"我听到他这句口头禅，仅此一次。

他在汉驻跸的时间并不长（约三、四个月就仍回南昌去了），而外间流传他的轶事却不少。举例言之，如他因鄂东军事失利，再度起用已罢黜的徐庭瑶。召见时，徐呐呐絮述他指挥失机的原因。蒋不待他讲完，就拍桌子申斥"强辩！"因为宁波口音，徐误

听为“枪毙”，立即面如土色，两腿瘫痪。蒋见到他的神色，知道误会了，马上改口说：“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派你去当第一路军总司令，好好干！”徐这才如梦初醒，喜洋洋地去重新带兵。

我最后一次见到蒋是在一九四六年初，他从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在上海露面。有一天，在三马路市府（原公共租界工部局旧址）大客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我当时还在《大公报》任总编辑。他讲些什么，记者们提出什么问题，我现在已毫无印象了。只记得《文汇报》年轻记者唐海曾发问：“现在全国团结建国，请问主席：张学良将军何时可以释放。”我侧目看蒋的脸色立时煞白，怒容满面，后立的戴笠、唐纵等都两目射出凶光。招待会就此收场。

当晚，《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兄邀我（那时我还协助严照顾文汇报的事，翌年三月，才向大公报辞职，再主持《文汇报》）同去见张道藩，请其代为解释。张还一再说：“唐海不是共产党，你们能担保么？”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汇报》被封闭。翌年春，我冒险去港，筹备创刊香港《文汇报》，淮海等三大战役以后，蒋即宣告下野，退居幕后，而南京政府旋即土崩瓦解，自然，我和蒋再无见面的机会了。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

我任蒋介石监印官追忆

姜辅成

我今年八十三岁，原先是个商人，一九二六年在北伐军总司令部做监印工作，跟随蒋介石当了十四年监印官，小心翼翼地替蒋介石看管“玉玺”，后来又做了六年的参议，前后二十年，由中尉校对员升到少将科长，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军事委员会撤销解职归里。

监印员职小责任大。蒋介石统治旧中国二十二年，他从北伐军总司令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党、政、军一手独裁。举凡各省主席的任命，军事长官的调动，财政军需的调度，以及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代电等等，都要盖上这颗“玉玺”。我为蒋介石盖了十四年印章，不知发出了多少文件。

（一）

一九二五年以前，我在上海和奉化人应梦卿同做交易所投机买卖，为沪海交易所四号经纪人。那时，国民党ＣＣ系头目陈果夫也在上海干这一行，他是物品交易所的四号经纪人。应梦卿留学日本，在日时加入同盟会，曾为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监印员，和蒋介石、陈立夫等都相识。这年春季，我们的交易所因经营股东买卖亏本，宣布清理停业，我由杭州高义泰绸庄老板介绍至嘉兴伟成丝厂当收发，应梦卿则离沪投奔蒋介石去了。

那时，蒋介石已率领北伐军分三路北上。一九二六年冬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应梦卿在南昌写一封信给我，要我立即赶到那里去接他的事。我到了南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见到了应梦卿。应梦卿介绍我跟机要科长陈立夫见面，随即匆匆地把他所担任的监印兼校对公文的工作移交给我，第二天他就随着白崇禧的东路军出发了。

北伐军总司令部，除总政治部外，有参谋处、海军处、航空处、军需处、审计处、军法处、副官处、交通处、秘书处等等。那时是军事行动时期，各处都分散在几个地方办公，驻在南昌督军衙门的只有参谋处、秘书处和副官处等。我被派在总司令部监印室工作，监印室由机要科领导，机要科又属于秘书处管辖，我除向秘书处处长李仲公和机要科科长陈立夫请示交谈以外，别的部门长官的名字都不很清楚。我因一向经营商业，除巴巴结结管好自己份内工作以外，任何事情概不过问。

监印室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人，除我以外，另一个是奉化人沈绍洙。起初沈任监印，我当校对，不久沈去九江，我任中尉监印员。从这时起，我就跟随蒋介石奔走南北，开始我武官文职的政治生活。

北伐军总司令部官印厚约八市分，长约二寸见方，木制，包锡，上加长约三寸的木柄，是个极普通的官印。听说这是北伐军从广州誓师出发前，叫一个刻字匠到总司令部刻的，这和封建帝王时代的金印、铜印就不可相提并论了。国民党在大革命时尚知因陋就简。“蒋中正”三字的签名章，也是个木章。

因为随军北上，总司令部随时要移动，印章的保管工作十分重要，陈立夫在我正式担任监印员之时，特地叫我到科长室谈话，叮嘱若发生动乱不测情事，千万别忘记携带印章，他还向我警告说：“印在人在，印亡人亡。”我到南昌总司令部后，小心翼翼地守住这两颗一大一小的印章，连南昌的大街也没有去过。不久，北伐军攻克九江，蒋介石率领总司令部秘书处和副官处的部分人员到九江成立临时办公处。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第二军和第八军攻克南京。我们驻在南昌的总司令部奉命移动，由九江乘小炮艇，沿长江向南京进发，等总部抵达南京之时，上海方面战事急转直下，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协助北伐军打败了孙传芳军队，蒋介石又率领总司令部部分先遣人员，到达上海。

南京攻克后不到七天，总司令部抵达南京，全城满目疮痍。中山东路原孙传芳督军衙门里，公文纸张狼藉满地，桌椅杂物残缺不全。可见军阀孙传芳在败退撤走时，惶惶如丧家之犬，狼狈不堪言状的了。

我在南京督军衙门（后为国民政府官衙）共住三天，一时找不到床铺，就在衙门内找到三块旧铺板，但又找不到搁铺的长凳，只好在当作临时监印室的石板地上，铺上铺板，席地而卧。好在时间不长，四月三日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我们秘书处和副官处的留京人员又都整装向上海出发。

重回上海，我已由一个商人变为军人了，住在龙华交涉员公署。当天陈立夫就跟我说："目前一切均未建立制度，大局又未稳定，一应重要公事，你要设法自己保管。"北伐军总司令部没保险箱，却要我自己保管总司令部大印，只好自想办法。我看到龙华南市一带乱哄哄的，心想还是租界上太平。当晚我就想到有一个堂伯姜忠铨，在外滩三北轮船公司当总会计，决定带着大印去找他设法。我把部印和蒋中正印章装在一只黑色的公事包内，到法租界找到我的堂伯，跟他说明来意后，我的堂伯也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于是，我们两人匆匆乘一辆出差汽车到外滩三北公司的写字间，公司里的职员都已下班回家了，只有二、三个看屋的工友还在。我的堂伯姜忠铨带我到他的写字间，打开高约四尺的保险箱，把我的小公事包放在里面，听到保险箱的弹簧锁"啪"的一声关上，这才似释重负的离开三北公司。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又到三北公司从保险箱里取出总司令部大印，赶到龙华交涉员公署

替蒋介石监印。如此来往三天，直到副官处不知从那里搞来一只半旧的保险箱，我的小公事包才不到三北公司的保险箱去"借宿"，而有了自己的"宿舍"了。我在上海龙华交涉员公署，约有二十多天，深居简出，守住这颗大印，却全然不知道已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

（二）

北伐军总司令部迁至南京，南京督军衙门大事修饰，粉刷一新，办公用具及桌椅等也添置了不少，跟我第一次到南京时的情形大不相同了。不久，国民政府从广州迁来，督军衙门改为国民政府的办公厅，北伐军总司令部另迁至三元巷新址办公。

三元巷总司令部是老式的楼房，建筑并不好，房屋也不宽畅。监印室和副官处在楼下，总司令办公室在楼上。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都在总部。其余如军法处、军械处、军需处、交通处等均另设办公地点。总司令办公室，有总参谋长杨杰和秘书长邵力子，办公厅主任是嘉兴人吴思豫，参谋处处长葛敬恩、副处长徐培根，该处分三科，第二科是作战科，科长盛世才，和我时有接触，其余一、三两个科很少打交道。盛世才所拟的作战计划有保密性质，每次要在计划上盖总司令部大印，多由他亲自来盖印。有时遇有紧急公事要发，半夜到我的寓所来敲门，我从被窝里披衣而起，开门请他进内等待片刻，这时就不免互相闲谈起来，所以对盛世才的印象比较深刻。

秘书处处长李仲公，这时好象派往前线，不见他来总部办公。秘书处下设文书科和机要科。文书科长毛思诚，奉化人，是蒋介石原配毛氏的本家，原是蒋介石在私塾读书时的老师。机要科长仍由陈立夫担任，陈实际上负秘书处全职，权力很大。记得有一次，总司令部来个穿着竹布大衫的青年，在楼下客厅里走来走

去，等待着陈立夫回来，象有机密大事要商谈似的。我上楼去办公厅请示，等我下来时见他还没走，就悄悄问副官处一个姓汪的副官，他告诉我：那人叫戴笠，是跟陈立夫干秘密工作的。时隔十一年，我在重庆军委会当上校监印员时，一天，办公厅送来一份委任状，赫然发现了戴笠的名字，竟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的副局长了。

机要科的秘书有柴宝礼、高凌伯、徐思道三人。除监印室外，主要是译电工作。监印室仍是我和孙绍洙两人。监印工作，本来并不太忙，除在作战紧张阶段外，发指令和委任的公文并不太多，但在这一阶段却有例外的差事，那就是交通处每天送来的火车票，要盖印十多本，忙得不可开交。当时因在军事时期，交通部没有正式成立，京沪、沪杭、京浦路的火车票，归总司令部交通处控制，由交通处派员到车站出售。这种火车票非常特别，阔约二市寸，长约四市寸，每页分正票和存根两联，是用铅字印刷的。骑逢中间盖上总司令部的大印，买票时还要注明从某站到某站，以防越站乘车，手续很麻烦。

还有一件颇为特殊的事，也可以提一提。在三元巷总司令部的楼下客厅里，高挂孙中山遗像，每到星期一，蒋介石必出席纪念周，全体工作人员站立着听他的训话。他则操着奉化官话大谈三民主义。训话结束后，值星官早已将写有全体工作人员名字的竹签筒双手捧上，蒋介石随手从签筒里抽出一根名签来，被抽到签的人当场要背诵总理遗嘱，背不出时就要当场训斥。有些年老记忆较差的人，怕临场心慌出丑，事前向值星官打个招呼，请他不要将自己的名签插进去，象小学生怕背书似的逃过了这一关。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下野后，北伐军总司令部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大部人员照常供职。我升为上尉监印员。军事委员会的大印是木制的。这个机构采取委员制，由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李烈钧等九个委员集体负责。由军委会发出的公文，除盖委员会

大印外，同时盖上九个委员联置的名字章。委员名字的排列是上四下五，大小跟普通洗衣用的板刷相同。我们秘书处人员暂时没有变动，办公厅主任则换上了桂系的马晓军。约一两个月以后，蒋介石上台，北伐军总司令部又告恢复，马晓军也离开总部调往别处去了。

（三）

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准备继续出师北伐，在南京遣兵调将，忙乱一阵。三月初，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派遣部分人员随军北上，机要科和副官处参加的人最多，我也带着印信随军出发。大军在徐州驻扎一月，开赴济南，讨伐山东督军张宗昌。攻打济南时，总司令部就设在火车上办公，车上加了煤，万一前方军事失利，可以随时向后撤退。我从南京出发时，定做一只皮革制成的旅行背包，总司令部的大印就装在那个背包内，终日不离身边，吃饭睡觉时也带着它。

军阀张宗昌的军队不堪一击，大约打了五天光景，张宗昌就仓惶撤退。他跟日本人勾结，企图反攻。张部拥有意大利制造的轰炸机，我们驻在济南督军衙门时，张宗昌派飞机来轰炸总司令部。我听到飞机响声，连忙背上背包，携带印信，逃到郊外草子田里躲避，这次炸死副官处一名司书。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济南发生了日军惨杀我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并屠杀我同胞的惨案。但蒋介石认为对日本帝国主义只能退让，向部下发出"绝对不能向日本人开枪"的训令，由我盖上总司令部大印发给各部执行。

蒋介石在济南时，住在督军衙门后面一幢房子内，门前有一条贯通南北的溪流。有一天，他派卫士来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盖印，我即持印前去，走进门，见参谋长陈铭枢在座。我向蒋立正

敬礼，蒋还礼后，取出一个三角形的竹布白旗，上书一“令”字，命我在“令”字上盖印。当时我即醮好印泥，正欲盖印时，蒋对我说：“要找些东西垫一垫吧！”随即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本书来，叫我将白旗放在书本上，然后盖好总司令部大印，即匆匆持印退出。这个白布令旗不知发给那一个将军的，至今还是一个谜。我生平为蒋介石监印十四年，也只有这么一次是在白布上盖印的。

北伐战争很快地结束了。蒋介石跟冯玉祥、阎锡山订好盟约，北方大局已定。总司令部全体人员从济南到临清，不久又到保定，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回到南京，总部仍设在三元巷。

张学良荣任为中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时，南京总部所发出的委任、训令等等，一度在总司令蒋中正后面盖一颗张学良的名字章，但时隔不久，机要科法文秘书毛庆祥有一天到盖印室特地告诉我说：“张学良的名字以后不要盖了。”我当即将张的名字章交给他，以后仍保持总司令单独署名的老办法。毛庆祥是奉化溪口人，他父亲毛颖甫在溪口街上开设酒坊，毛庆祥留学法国，在南昌总司令部时任法文秘书，北伐胜利后，在蒋的官邸任收发，名义上是蒋的私人秘书，以后任军委会机要室主任。

（四）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间，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总司令部宣告结束。三元巷原址成立军队编遣委员会，全国共划分为五个编遣区，准备整编各省军队。机要科长陈立夫改任为建设委员会秘书长，原总司令部人员，一部分留在编遣委员会供职，一部分跟随蒋介石调到国民政府，我也调到国民政府监印室工作。那里的监印室归文书局管辖，局长为江西人杨熙洁，监印室名义上由一个姓杨的秘书为监印员，我为校对员，实际监印的仍是我。我在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